

一个变性手术专家的手记



变性手术专家何清廉(张耀智摄)

本文提及的易性癖患者还要走漫长的人生之路,为免去他(她)们不必要的麻烦,皆隐去真名。

这是一个隐秘、离奇、令人扼腕叹息的世界。

许多个男人和女人,从花甲之年的老翁老妪到十来岁的祖国花朵,从学识渊博的教授到目不识丁的农民,在痛苦、烦恼、绝望中挣扎。他们在医生面前长跪不起,泣不成声:“救救我,我要变性……”。

他们得了一种怪病:易性癖。什么是易性癖?简单地说,就是男人想变成女人,女人想变成男人。

明明是一种病,可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她)们却被视作“流氓”、“道德败坏”,甚至受到行政、司法惩处。

医学的进步、社会大环境的宽松,终于给广大易性癖患者带来了福音。1990年7月,我完成了我国首例公开亮相的男性变女性的变性手术。1991年10月,我再次大胆突破,完成了我国首例女性变男性的变性手



□何清廉

术。

三年来,我接触了大量易性癖患者,深入了解了他们(她)们的内心世界,并为之震惊!我感到,我有责任把我知道的写出来,以求得社会对易性癖患者的了解、理解、同情和帮助。

第一个公开亮相的变性人

世界变性手术史是从美国的马里欧·马丁诺开始的。1953年,他对一位嘴上没毛、乳房高耸、在女性世界中生活了30年之久的修女,通过变性手术成为嗓音洪亮、满脸络腮胡子的男子汉,在人类医学史上树起了一块里程碑,地球上也因此产生了变性人这一新的群体。

揭开我国变性手术史的,则是一位极富勇气的易性癖患者,他叫秦惠荣。

1990年春季里的一天,一位奇怪的就诊者来到了我的诊室。说他是男人吧,他却长发披肩,一身女装,举止妩媚;说她是女人吧,他却嗓音粗厚,喉结突出。进一步的检查更让我吃惊,此人的男性生殖器官严重残缺,没有睾丸,仅有一小截阴茎。

在我的询问下,这位病人敞开心扉,述说了自己痛苦的病史:

“我叫秦惠荣,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今年27岁。在童年时,我是个典型的男孩,整天和小伙伴们野在外面玩。可是进入青春期以后,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内向,不再喜欢和男孩们在一起,却对女孩的艳丽服装产生了兴趣和向往,感到自己应该是个女孩,为自己男性身份而纳闷、痛苦。高中毕业考上复旦大学外语系之后,我的女性化倾向愈益严重,开始外面穿男装,里面穿女装。外语系的师生们都比较新潮,也没人以我为怪。

“1985年毕业分配前夕,北京一家军事科学单位挑中了我。可是我觉得我有想当女孩的病,又喜欢穿女装,不配当军人,就报名到云南一家大学去当老师。

“一到云南,我便迫不及待地将所有男装及男性用品全部扔掉,买来许多女装及化妆品进行打扮。大学里的同事们认为人各有所好,我又是从大上海来的,又是搞外语的,对我也没什么责怪。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7年那个圣诞节的晚上。

“那天晚上,我感觉烦躁,在无法自控的状态下,用一片刮胡子刀片割掉了自己的双侧阴囊。当时大量出血,被送医院住了8天。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也觉得害怕,但当时我不觉得特别疼,心里还充满了胜利的快感。可是,学校认为我‘道德败坏’、‘不宜工作’,将我退回复旦大学重新分配工作。亲朋好友也对我有看法。

“但我的病却仍在发展。几个月后,痛苦和烦躁又一次驱使我自己动手切除了阴茎,便成了个不男不女的人。不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扮演的社会角色上,我都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请您一定救救我……”

听完秦惠荣的诉说,我明白,秦惠荣患的是种叫易性癖的性变态疾病。

医学辞典对易性癖的解释是:性别方面的心理变态,患者深信自己是另一性别的人,强烈要求改变其性解剖结构,为此要求做变性手术以使其性解剖结构符合个人信念。

人类对易性癖现象的注意和观察古已有之。但是对易性癖现象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并取得重要进展却是近四十年的事。1964年,著名易性癖专家何欧尼格将易性癖特征概括为经典性的四点:一、深信自己内在是真正的异性;二、声称自己是异性,但躯体发育并非异性,亦非两性畸形;三、要求医学改变躯体,成为自己所体会的性别;四、希望周围人按其体验到的性别接受自己。

后来,进一步的研究揭示,男性易性癖患者的特征为:外表为男性特征,男性生殖器官完整;他们早在三至四岁时就可出现明显的女孩兴趣和行为,到了青春期及性成熟后,他们企图改变性别而出现自残,受痛苦的折磨而进行自虐性伤害,甚至自杀;为了缓和内心的冲突,他们会偏爱女性打扮;当易性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常极为痛苦,孤僻内向,不喜交际,充满内疚感、悔恨感。

对照来看,秦惠荣正是典型的男性易性癖患者。

要不要给他做变性手术?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过去,我曾为一位因事故失去阴茎的病人再造阴茎,使这位病人不仅结婚,还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我还为一位结婚5年、因先天没有阴道而从无真正性生活的石女重建阴道,使她和丈夫从此拥有了美满的婚姻生活。但象秦惠荣这样因患病自残而要做变性手术,我却是第一次碰上,在全国也从未见诸于报道。虽然凭着自己的经验、医技及参照国外文献,我有把握完成这一手术。但这一手术涉及到人的社会角色、道德伦理、心理卫生以及社会规范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必须慎之又慎。

我和助手们详细了解、诊断了秦惠荣的病史和病症,确认秦惠荣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同性恋,而是患了严重的心理变态范畴内的易性癖。由于其自残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若不及时施行手术,秦可能失去工作和生活能力。同时,秦惠荣是单身,改变其性别对社会、家庭和他人均无直接的妨害,因此,我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决定为秦施行变性手术。

手术于1990年7月25日和8月10日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将残缺的阴茎切除,利用敏感皮肤改造阴部,做成人造阴唇、阴蒂和阴道,尿道改植成女式。第二次又为其做了一对手感柔软、均匀对称的乳房,同时作了喉结切除手术。尔后,她又在妇产科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了激素调整等一系列治疗。至此,在经历了10多年困惑、躁动和痛苦之后,身高1米60、体重50公斤的秦惠荣,终于梦想成真,从“他”变成了“她”。同年8月底,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遇到了您。现在我感觉良好,不再有术前的那种紧张感、烦躁感、忧闷感、凄惶感和对生活、对前途的迷茫、失落、绝望。在我眼里,世界已越来越色彩缤纷,美好又可爱。我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充满希望!”

据了解,在此之前,我国曾悄然进行过2例变性手术。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手术后两例变性人旋即与医生失去联系,如黄鹤飞去,杳无踪影,连手术效果如何也不得而知。但是秦惠荣却以极大的勇气表示:愿意公开自己的一切,让全社会理解、帮助我以及所有还在受煎熬的易性癖患者。由此,秦惠荣成了中国首例公开亮相的变性人。

哭泣的灵魂

秦惠荣的变性手术经新闻媒介披露后,引

起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也为那些饱受痛苦的易性癖患者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一时间,来信来电雪片似地飞往一些以整形外科著称的医院。我们长征医院更成了热点,我一共收到了一千多封信,而且每天还在增加。来信的易性癖患者遍布全国除西藏、台湾之外的各省市,香港、日本也有患者来信来访。最多的一个患者一共写了40多封信。他们中有教授、研究生、工人、职员、医生、农民、战士,可谓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各个阶层都有。年龄最大的56岁,最小的才10岁。

“以前我从不敢对人说”——封封信都是宝贵的医学资料;“救救我——封封信都是有着血泪史。

刘建军是济南一个公司的推销员,今年33岁。他说:“我总觉得自己是女人,从7岁记事起就开始了。起初是偷穿姐姐的花衬衣,模仿女人腔调说话。高中毕业参军时,偷偷买了女式服装,并把一些军裤改成女式,借口外出躲在僻静处换上以满足心理的要求。复员后变态心理愈益难以控制,常把刚发下来的工资一咬牙买了妇女用品打扮自己。25岁那年,在父母督促下我结婚了,下决心把以前购置的女式服装及化妆品全部扔掉。可是,没过多久,旧病就复发了,乘妻子上班时穿上她的衣服、乳罩,涂上口红,戴上耳环,修剪眉毛,过过瘾。妻子发现后同我大吵大闹,搞得家里鸡犬不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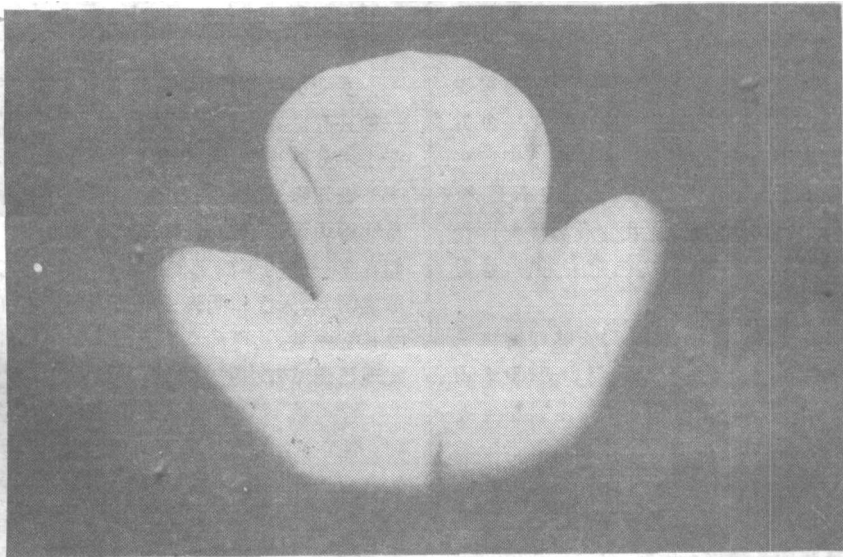
王新安是福州一家工厂工人。今年28岁。他说:“自小我就整天和女孩一起玩,跳橡皮筋、织毛衣、裁剪服装等凡是女孩会的活我全会。10年前我进厂工作后,没进过一次男厕所,没进过一次男浴室,不管春夏秋冬都在家里洗澡,尿再急也要憋到家里或无人处去解……”

令人吃惊的是,来信来访的易性癖患者中女性占三分之一,且大多正处妙龄。

杨莹晶是上海一家公司的计算机操作员,今年22岁。她诉说道:“那是在上初一的时候,

随着女性月经的来临,我开始羞愧自己是个女性。我讨厌尖细的声音,讨厌女性的外表特征,更讨厌女性特有的月经。到了乳房隆起的时候,我就死命束胸,还尝试过用药物停经,睡觉时用砖头压住双胸但是做不到。万般无奈的我常会在夜深人静之时跪在地上,祈求上帝把我变成男人……”

23岁的刘晖是武汉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她说:“我恨父母,为什么生了我一个女儿身却给了我一个男儿心?我做梦都企望自己是个男人。每当痛苦得不能自拔时,我就用刀一点点地划自己的身体,划得全身伤痕累累……”



更可怕的是,不少易性癖患者在痛苦烦恼难以排遣、难以自控的情形下,采取了过激的自杀、自残行为。

河南省 25 岁的患者洪亮每当看到自己的男性生殖器官就痛恨,1991 年春天,他一气之下,用水果刀穿刺辜丸。后因伤口感染住了半个月的医院。1992 年 4 月,山东一位患者在自残时用尖刀刺破阴囊,再用气筒往里打气,结果形成全身性气肿,差点送了命。

据我一年多前的统计,来信要求做变性手术的 295 人中,有十多人自残,二十多人自杀过。超过自残念头的有 44 人,自杀念头的有 76 人。自残、自杀的比例如此之高,为其它疾病所罕见。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些父母不忍看到孩子在痛苦中被毁掉,急切地向医生求救。

南京一位易性癖患者的父母给长征医院的信中说:“昨天,我在报上看到你们成功地做了一例变性手术,顿时感到我们的孩子有救了。我们盼来了救星。我抱着十二万分的激动心情,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

东北一位年轻母亲为其尚年幼的孩子发来求救信:“我有 2 个女儿,大的 12 岁,一切正常。小的才 10 岁,却不同。她喜欢留平头,穿军装,玩枪使棒,与男孩子们结帮拉伙。常常吵着要做男孩。有次看见一个男孩开裆裤里的‘小牛牛’,伸手就去揪,说要揪下来安在自己身上,揪得变了色也不松手。我告诉她安不上,她很失望,哭着求我:‘妈妈求求您,让我变成男孩吧!我愿干重活,长大当军官……’我们实在无法可想,恳请您们救救我的孩子吧。”

遗憾的是,象这些有文化、有理智,能够理解孩子的痛苦与不幸、体谅孩子苦衷的父母也属少数。更多的家庭则大多对患病的家庭成员加以痛责、谩骂甚至殴打,加深了患者的痛苦。浙江农村 24 岁患者高贵根来信说,他的亲朋好友都咒骂他,赶他出门,要断绝与他的关系。他在信中说:“前天,堂兄建议父亲把我往死里打。还有人建议在我前脚跨出家门时,家里人找出我的衣服浇上汽油点燃,给我举行一个隆重的葬礼……”

读着这一封封浸透辛酸、血泪的来信来电,搀扶起一个个长跪不起、泣不成声的易性癖患者,我们的心震颤了。医生的天职和责任撞击着我们的胸膛,驱使我们继续探索下去,为易性癖患者寻求一条脱离苦海的希望之路。

具有世界水平的变性手术

1990 年底,一个 27 岁的姑娘,拿着登有何清濂为秦惠荣做变性手术消息的报纸,急匆匆从外地来到上海长征医院,要求变为男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又四次往返行程达 2 万多里。陪她来的母亲几次下跪,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恳求:“救救我的孩子吧!”

这位名叫李一妮的姑娘是外地一家宾馆的服务员。她从小就象个野小子,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翻墙爬树。父母发觉她太野,逼她和女孩子一起玩,她却总是欺负别的女孩子。长到十三、四岁,她的个性更趋男性化,理男孩头,穿男孩装,踢足球。此时起,她开始萌生一种渴望——将来要成为一名男子汉!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这种渴望愈加强烈,内心也更加痛苦。在失控的情形下,她先后 3 次自杀。第一次服安眠药,昏睡了 2 天后醒了过来;第二次服降压片,被抢救过来;第三次是切腕,被家人及时发现送医院缝合。但她一直没有断了死的念头,直到象发现救命稻草似地读到了有关我为秦惠荣施行变性手术的消息。

我们对李一妮的病情作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她已处于一种严重的病态之中,如不及时对她作手术治疗,这个病人将丧失工作能力,甚至会有性命之虞。在李一妮写下手术申请书,并取得父母、单位、居委会、派出所的同意手术的证明之后,我决定为李一妮施行我国首例女变男手术。

女变男的变性手术,较之男变女,要困难得多,是一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变性手术。为慎重起见,我决定手术分两步走。第一次手术在 1991 年 10 月进行,为李一妮切除了乳房和女性生殖器。手术很顺利,病人的易性癖病得到了稳定。第二次手术在几个月后进行,我们在李一妮的下腹部制成了一个乒乓球板状的皮瓣,形成阴茎、尿道和阴囊。人造阴茎因有血管神经、血运及其它感觉,几可乱真。通过一定时间的适应期,李一妮现已能站着小便。

李一妮回家后给我来信说:“我现在心里好开心呵。痛苦与死亡已离我远去,我要为新生活去奋斗。虽然会有困难坎坷,但是,严冬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最近,我又运用自己创造的阴股沟皮瓣新法,完成了第二例女变男手术。这样,加上以前完成的 5 例男变女手术,我们共成功完成了 7 例变性手术,为我国整形外科一个新崛起的分支——变性手术,积累了开创性的珍贵的临床经验。

可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从小心翼翼的试刀到迈入国际先进水平之列,只用了两、三年时间!

变性之后

如愿以偿的秦惠荣、李一妮等变性人愉快、兴奋的心情自不待言。但当他们走出医院,以另一种性别角色重返社会之后,社会回报给他们的,又是怎样一种脸色呢?

秦惠荣手术出院后,在复旦大学领导的关心下,住进了一幢女生楼。尽管她是独居一室,但左邻右舍的天然女子们对这位“不速之女”颇有戒心。有几位还去校长室提交“照会”,意欲“驱逐”。校领导含笑答曰:“秦已是女性,不住女生楼,难道住男生楼不成?”

自然,也有胆大的女生三两天接触下来和秦混熟了,倒也相安无事。秦大学同班的一位女生留校任教,常与秦碰面,也不以为忤。让秦惠荣最伤心,是家里人认为她给祖宗蒙羞,断绝了和她的关系。

尽管有一份吃香的外语专长,但在手术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秦惠荣一直没找到工作。一些原本很需要外语人才的单位,一听其变性人的身份,便避之唯恐不及。后来,上海市政协主席、复旦老校长谢希德闻得此事,伸出援手,方便秦惠荣找到了“饭碗”。现在,秦惠荣已改姓更名,只有单位领导知道其变性人的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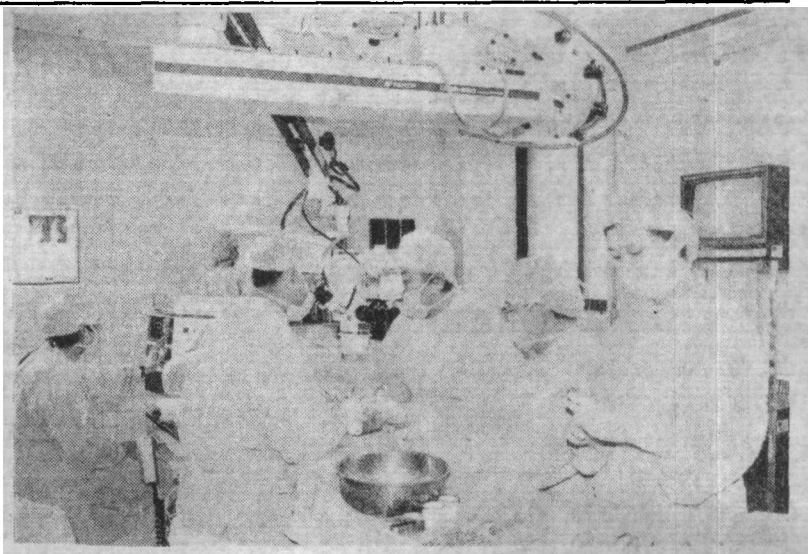
正因为如此,她准备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她这样阐述写书的目的:“让全社会理解我以及所有还在受煎熬的易性癖患者。”

再说说其他变性人。李一妮变成男人回家后,同事们纷纷前来看望他,称赞他“好帅的一个小伙子。”单位领导还允诺报销他数千元手术费。李一妮准备待身体完全康复后即去原单位上班。我做的第二例“她”变成“他”后,已与一个姑娘谈起了恋爱。一位男变女的演员变性效果非常好,目前已以女性身份正常演出,并参与了电视剧拍摄,没有人对她的性别提出过疑义。

顺利也罢,坎坷也罢,在易性癖患者中,这些变性人是真正的幸运儿。这种幸运的机率,绝不会多于一夜暴富的股民。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易性癖与其它性偏离症一样,鲜为人知。患者得了这种病羞于启齿,旁观者也难以接受,以至于前些年我国一本医学专著上说我国仅见一例易性癖病例。但据国外的研究资料显示,易性癖在男性中的发病率为十万分之一,在女性中的发病率为十三万分之一。据此推算,我国易性癖患者近一万人。而在他们之中,接受变性手术获得痊愈的仅数十人。

众多的灵魂在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折磨下呻吟。他们企盼着能够早日解除痛苦,企盼着重塑性别角色,重



□ 手术正在紧张地进行

新开始生活,堂堂正正做人。

云南一位患者哭求:“目前的痛苦生活已使我无力自拔,变性手术是我唯一的机会和希望了。恳求医生尽快给我手术,如果拒绝的话,你们也许再也听不到一个远在边疆的患者的哭诉了……”

江苏一个26岁的小伙子说得更是辛酸:“如果你不救我,那我岂不要一辈子在性别的边缘上挣扎?我请求你们可怜可怜我好吗?就象在街上看见一只饿得要死的狗,赏它一口饭让它不死那样赏我一个我赖以生存的‘性别’好吗?我已经不能适应男人的生活了,却能做个好女人,可我为什么还是男人?”

甘肃一个28岁姑娘从新疆一个边境收容所寄给我一封用铅笔写在卫生纸上的信:“我是一名性转移的女人,有很强烈的变性欲望,到过北京,不给我做变性手术。又到上海找你,你偏偏出差去了。我失望了,看到报纸上说瑞典可以做,我便来到新疆,想偷越国境去瑞典,但被抓了……”

不少患者不断给我写信。多的已有二、三十封。东北一位研究生说:“如果你不肯给我手术,我就给您写一辈子的信!”有些患者甚至以死相求:“如果你们不答应,我就来上海找你们,我一定要死在医院里,死在你们面前!”个别患者则把手术费用也寄到医院里来,以为这样就能迫使医生为其手术。

翻阅数千封易性癖患者的来信和数十例就诊记录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易性癖患者都希望早日手术。因为他们确信,自己只有在做了变性手术后才会幸福。他们遐想着手术后痛苦顿除,烦恼皆消,一切万事如意;想像着手术后新的性别带来的巨大快乐。这种想法令他们激动,令他们陶醉,同时也令他们更加迫不及待

地,有时甚至是疯狂地要求手术。

说实话,我很同情他们。他们在苦苦等待着,找着能够为他们施行手术的医院,其急切、焦急的心情就象在辽阔无际的茫茫沙漠中,行走得精疲力尽且已多天滴水未尽焦渴难当的旅人,还在又绝望又不甘心地寻找着水源。

然而,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我实在是爱莫能助。

拯救更多的苦难者

每一个给我写信要求做变性手术的易性癖患者都会收到如下复信:

“同志:您好!

为了给您保密,台头就不写了,想您会赞同的。您信上所述的痛苦,我们深为同情和理解,希望您安心工作、学习和生活,就地治疗,与疾病作斗争,自我解脱烦恼。

最近来信要求变性手术的人太多,有关部门不同意开展此项手术,我们无法安排,概不接受,请谅。若同样问题提出,亦不再回信,歉甚。

如果您愿意,可将发病、治疗、家庭情况等等来信详告,以利今后治疗这类疾病的参考。

请您:

1. 切勿来院,来了不接待,不收治。

2. 切勿自残、自尽,自找痛苦。若如此,亦不会收治。

3. 切勿退学、退职,对自己不利。若如此,亦不会收治。

致

礼!

上海长征医院整容外科”

这封信既亲切又冷酷,为此我没少化心思逐字逐句地捉摸。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因为,医学发展到今天,形成了成千上万种手术,其中最具有争议的,也许就是变性手术了。我个人也认为,目前变性手术在我国不宜推广,必须慎之又慎。

难题有三:

不少人一听到易性癖就想到同性恋,其实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性恋患者的特点是在幻想或实际生活中,喜欢与同性个体发生性关系,它是对别人的感觉。而易性癖患者的特点是对自己的性别认同产生困扰,它是对自我身心的感觉,并不是一种性关系的方式。但是,从众多的求诊来信中发现,有时候同性恋与易性癖有交叉,有时难以判别,这样问题就变得复杂了。此其一。

易性癖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发性易性癖是与生俱来的,占一小部分。大多数易性癖都属继发性,它是患者受家庭、社会等影响后天产生的。一般来说,对原发性易性癖患者可以放心施以手术治疗。对于继发性易性癖者则最好采取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治疗,同时辅以药物。如贸然施以手术,继发性患者有可能发生后悔。但是,原发性易性癖和继发性易性癖的界定,又颇费思量。此其二。

其三,在西方国家,医疗部门特设有变性咨询机构,由性心理、精神分析、内分泌、泌尿、整形、妇产科和法律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对要求变性的患者进行一系列分析、检查、研究,然后再集体决定是否手术。这一系列步骤显然是必需的。但是,目前我国尚无此专门机构,大面积推广变性手术有可能出问题。

因此,我们对变性手术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在通过一系列严格甄别确诊为真正易性癖后,患者在手术前必须解决和考虑到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诸如手术后的工作、生活、经济、家庭组成、社会舆论等等。患者还需有适应性准备,如日常生活中试行异性行为及角色1至2年,服用药物以取得心理平衡等。然后患者还需提交各项证明,包括:个人申请、公安部门证明、精神病院证明、居委会证明、父母兄弟姐妹证明,已婚者还需解决好配偶问题并出具证明。最后再由医院报有关部门审批。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这样做,为的是促进变性手术这门新兴的、严肃的医学事业健康发展,使真正的易性癖患者得到治疗,得到幸福。

正因为严格按照原则办事,我们目前所做的7例变性手术全部成功,7个变性人没有出现任何反常情况,其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与术前判若两人。

我还想说明一下,我们做变性手术和国外搞“人妖”完全是两码事。在泰国等国家专门挑眉清目秀的男孩,给他们服用药物或手术,变成男不男女不女的“人妖”,用于色情业赚大钱,这反映的是这些国家的社会阴暗面。而我们对易性癖患者做变性手术是为了治病救人。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由国家有关部门出面,拨出一定的经费,组成紧密的或松散的研究机构,加强易性癖诊治及变性手术等方面的研究、协调和交流,加强与国际易性癖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和沟通,为更多的易性癖患者解除痛苦。

让我们分一点爱、分一点同情、分一点理解,给那些易性癖患者,给那些在磨难中苦苦挣扎的灵魂!

(新华社记者 陆斌 整理)